

戈鯤化集

元旦試筆

全銷墨氣鮮喜將詩句賀新年和風習
占巽旭日曈曈瑞應乾甲子長春國大
申不老守先天滿斟一盞屠蘇酒首祝



I have just

finished a poem which I have

been writing for you, which I

enclose as a Christmas present.

张宏生 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

戈鯤化集

张宏生

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元旦試筆

氣全銷墨氣鮮喜將詩句賀新禧和國習
祥占巽旭日瞳瞳瑞應乾甲子長春同大
庚申不老守先天滿斟一盞屠蘇酒首祝

*I have just
finished a poem which I have
been writing for you, which I
enclose as a Christmas present.
I was disappointed
in not seeing you too
and as I wish very much to see
you about something particular,
it would give me great pleasure
to visit you sometime during the
Christmas vacation, if agreeable
to you. If it is, and you will l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鯤化集/张宏生编著,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10

ISBN 7—80643—053—9

I. 戈… II. 张… III. 戈鯤化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0758号

戈鯤化集

编 著: 张宏生

责任编辑: 高思原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33千字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053—9/K·29

定 价: 20.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哈佛：文化的多元与互动

杜维明

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在美国开风气之先，而且一开始就有进行东西文明交流的意图。早在 1879 年，当许多美国人还不知中国在哪里时，哈佛大学就已经从中国聘请教师，来康桥 (Cambridge) 担任中文教席。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举。虽然最初的动机多半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如对华经商的需求）以及文化输出的迫切（如传教活动的方便），但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谁知里面会跳出来些什么？很多行为都有不可预期的结果。当来自宁波的休宁才子戈鲲化出现在哈佛校园里时，他带来的就不仅是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还有中国文明的精神。事实上，戈鲲化在美国的学生并未带着功利的目的去学习，以后也不曾因此而从事商业发展，相反，他们更多是由于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兴趣，希望对异质文化有所了解，如美国最伟大的拉丁文教授刘恩 (George M. Lane) 之所为。我们可以想象，当戈鲲化用带有南方口音的中国官话教课时，在校园里具有怎样的震动。当然，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哈佛的宽容，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及互补的气度。

哈佛大学的汉学事业,自 1879 年发轫,至 1929 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遂进入一个新阶段。无论是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还是推动燕京的国学研究,以及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哈佛—燕京学社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中美乃至东西文化的相互认识 and 了解,这符合铝业巨子詹理士·霍尔(Charles Hall)遗产委员会的初衷(哈佛—燕京学社是由霍尔的遗产资助而建立的),当然也是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

1954 年,在第二届社长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的倡导下,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了“访问学人”项目,每年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邀请十余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前来康桥进行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1980 年和中国大陆学坛恢复交流之后,这一项目更加得到延伸,逐年到哈佛进修的大陆学人,累计已达百余名。他们在人文学的不同领域都是业有专精的学者,现在多半已在各自的学科挑起了大梁。

访问学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康桥,他们是哈佛文化环境的受益者。在这里,燕京学社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开阔视野,从事更广阔意义上的研究。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哈佛的文化也因为访问学人的存在而有了大幅度的变化,所谓受益,原就是双向的。这体现在,当这些访问学人来到哈佛后,他们所展开的研究计划就参与了哈佛的文化建设,使得哈佛文化能够更加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但全球化不能有所偏废。就美国而言,既要面对欧美,也要面对亚太;在亚太既要面对日韩,也要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二战以后,美国文化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强势,把日本带动了起来。美

国对日本的文化强势是全方位的,渗透在许多方面,它对整个东亚的态度当然也出于同一思路,即引导和要求人们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可是,如果在全球多元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仍然一味显示着这种傲慢,那么对它的发展极为不利。美国应该也必须转化关于学习的态度问题。它所学习的对象,应该包括东亚,特别是中国。在一个文明对话、文化多元的时代,忽略这个代表世界文明重要一支的国家和民族的资源,无疑是画地为牢。前些时,美国媒体播出了韩国国家电视台录制的讨论亚洲价值和亚洲伦理的节目,说明民众有这个关切和需要,也提供了这个问题在更广泛范围内论说的可能。那么,当这个信息被带到美国后,怎样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呢?这需要一个合适的中介,否则在西方文化占有强势的美国难免杂乱无章,转瞬即逝。大学的特色是求同存异,正是最好的中介。哈佛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作为全美人文科学包括东亚研究最发达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曾经抓住了多次机遇,包括敏感地从霍尔遗嘱中意识到东亚研究的可能性,因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成为举世闻名的东亚研究中心。现在,新的世界格局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哈佛来说,当然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能否进一步确立它的地位,并继续领导文化潮流,就看它是否能够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如前所述,哈佛的东亚研究在美国起步较早,经过赖世和、费正清等人的开拓,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即使如此,整个东亚研究在哈佛仍然处于边缘。一方面,缺少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涉及这一研究的学生也还不够多。当然这种情形也在发生变化,哈佛通过设置不同的中心课程,已逐

渐引起学生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兴趣。比较传统的课程如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比较现实的课程如讨论中国现代社会,特别是“文化革命”。参与这些课程的学生大概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如果在他们四五年的学习中,对东亚尤其是中国能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以后所引起的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大学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也必须选择经典,因为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基本典籍。问题是,确定经典的标准是什么?以往的美国大学,往往只在希腊、犹太或基督教传统中确立经典,很少言及东方。现在的情形有所改变,哥伦比亚和哈佛等校都注意了这一问题。另外,美国国会曾决定公民应该学习八本书,其中非西方的典籍是《论语》,相应地,美国国家电视台有一个对谈节目,也以两人对谈的方式,拿出一个小时来谈《论语》。从这种情况来看,将儒家伦理带入美国社会,或者说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发展儒家伦理,是有机缘的。

西方大学的教育对语言有特定的要求,汉语处在边缘。虽然汉语号称是世界上进行口头交谈人数最多的语言,但英语仍然占有绝对的强势。从互联网的时代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用英语,百分之五是用法语,其他各种语言加起来是百分之五,汉语大概只占百分之一强。这当然是历史造成的,一时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法国研究可以用法文来表述,德国研究可以用德文来表述,那么,中国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用中文呢?当有朝一日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可以用中文来表述时,那就开始意味着由边缘走向正常了(我们不说走向中心)。一旦走向正常,当然就可以为整个世界的人文学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这个过程当然很艰难,需要掌握

更多的文化资源,需要西方和中国的互动,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也许才能初见成效。但它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动力在不断增大,并和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发生互动,和中华民族的腾飞紧密关联。中华民族的腾飞,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信息,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将使文化的建构更加深化,更加富有生命力。哈佛的本科生一直有“China Table”的习惯,就是在餐桌用中文交谈。目前这个群体大多由亚裔(主要是华裔)构成,相信随着发展,会有更多的人参与,从而慢慢引起语言程度的改变。在哈佛东亚系的课堂上,现在已有老师尝试用中文教学,如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另外燕京学社每年还从中国邀请学人,一方面访问,另一方面用中文承担一门课的教学。这些,在美国的大学里都是相当独特的。如果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的华人社会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宽广的中国文化本体的氛围,并在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领域中进行,那么无疑会出现一个积极的、蓬勃向上的局面。

对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一向具有超前的眼光,目前所进行的计划之一,就是为哈佛的本科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一个学生,当他刚刚毕业,还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时,如果他掌握了一定的汉语,燕京学社可以为他创造条件,让他到中国去一段时间。他们选择中国,可能是为将来经营的需要,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不去选择同质文化的英国、法国等,而是选择了相对异质的中国,那在思想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带去和带回的资源都会促进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外的考虑可以从研究院层面来谈。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的

研究院里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生，都是美国大学里精英中的精英。这些人，不管其汉语程度怎样，对古典掌握得怎样，他们的智商在整个学术界都是最高的。他们如果从事其他行业，比如电脑业，将获利甚丰。但他们却偏偏选择进入这个领域，目的主要是面对思想的挑战，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等，相对他们原来所掌握的资源，能够挑战他们去发现或检验人类的共同价值。如果哈佛能为来自东西方的学者或学生都提供符合各自所需的试验场，那么，它的效应在不久的将来将更为明确地显现出来。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展开的。1993年，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根据1989年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相对抗所延续的国际政治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因而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最主要的冲突形式，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将会是世界政治的最重要的轴心。但我们认为，如果冲突果然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对话就更为必要。对话的传统是从马丁·布伯开始的，由宗教间的容忍发展到互相的参照理解和相辅相成。宗教对话使得对话者认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甚至可以从其他宗教徒那里学到更深的做基督徒的资源。因此，对话应该也必须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是中国学走向更深层次的必由之路。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是各种价值都互相发展的世纪，是多元而非相对的世纪。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去加以实践，那就不仅是大学，整个文化研究的层次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世界地球村的形成和完善也会得到更大的助力。

前 言

1879年7月2日,戈鲲化搭乘英国“格仑菲纳斯”(Glenfinlas)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大约经过50天的航行,抵达美国纽约,随后转往波士顿,开始了这位41岁的中国学者预计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学派出教师,去教授中国文化,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一百多年来,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在纪念他赴美执教120周年的时候,这种缺憾理应得到弥补。

戈鲲化的里籍

戈鲲化,字砚昀,一字彦员,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他的里籍一直不大清楚,现有材料一般认为他是宁波人,如在他逝世的当天和次日,美国波士顿的一些报纸先后发表文章,或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或说他“生于宁波”。^[1]这可

能是根据他来自宁波而想当然的认定,但这种说法至今仍在哈佛大学广为流传(如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的戈鯤化照片,下面说明即指其为宁波人),因而还有必要作些考察。

现存的宁波地方志,未见戈氏出生以后所修者,遍检《浙江通志》各志(如1948年出版的《重修浙江通志稿》),也没有任何有关戈鯤化的记录。当然这也并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因为戈鯤化卒于美国,编志者也很有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漏收。但戈鯤化本人的诗集《人寿堂诗钞》,他所编的《人寿集》,以及另外一些材料却足以使我们对宁波说产生怀疑。

戈鯤化在自己的著述中,^[2]多次自称“新安”人,这一说法,在章鋆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戈鯤化《人寿堂诗钞》写的序中得到了证实。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八《徽州府》和卷九十《严州府》,三国时吴置新安郡,隋移治安徽休宁县和歙县,宋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黄钰在光绪四年(1878)为该集写的序中称自己和戈鯤化“同里”。查《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黄钰传》,黄钰正是安徽休宁人。另外,戈鯤化《次韵答同里余右轩太史》之一写道:“同住乡关卅六峰,未能笠屐侍游筇。输君先我看明月,为说天都万芙蓉。”余氏也是休宁人,休宁在黄山脚下,三十六峰正指黄山,而天都峰则是黄山最高峰。《赠孙欢伯太守(熹)》:“井里叨同病复同。”自注:“太守原籍休宁。”《酬同里陈少白巡检(兆赓)六叠韵》之二:“行看献策谈经济,不愧吾乡江致虚。”自注:“宋休宁人,以乡荐入太学。”如此说来,戈鯤化应是休宁人。事实上,戈鯤化所编《人寿集》,于自己的四首《四十自述》诗下,里籍也正题“休宁”。另外,《人寿堂诗钞》所附歙县人洪照(字晓邨)和戈《送晓邨贰尹

归北野》写道：“我亦新安故里人，相逢客里倍相亲。练江舟楫黄山榻，好待同游趁野春。”歙县也在黄山脚下，似乎二人也有同乡的可能。但休宁和歙县都属于徽州，是新安旧地，这并不能成为戈鲲化里籍非休宁的证据。无论如何，戈鲲化非宁波人可成定论。^[3]

那么，考虑到明清两代徽州人出外经商者众多，戈鲲化是否有可能生于外地，仅仅寄籍于皖呢？似乎也不大可能。因为光绪三年(1877)戈鲲化自序《人寿堂诗钞》曾说：“岁乙丑，移砚甬上。”甬是宁波的简称，因境内有甬江流过而得名。细味戈氏此语，应是外地人流寓宁波的口吻。另外，鄞县(按鄞县属于宁波府)，陈勔在为《人寿堂诗钞》作序时也说：“砚昀游幕江浙间，以能诗名。同治乙丑始来吾郡。”这和戈鲲化本人的说法如出一辙。^[4]

综上所述，戈鲲化是安徽休宁人，而非浙江宁波人。他来到宁波的时间是清同治四年(1865)。

戈鲲化的早年生活及其诗

戈鲲化的家庭情况，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大约他父亲过世很早，母亲在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攻陷常州时，自尽殉节，受到皇帝的褒奖，入祀节烈祠。祖母吴太恭人，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卒于同治八年(1869)，享年75岁。戈氏自幼随祖母长大，诗集中有《大母吴太恭人小祥感赋》等诗，表达了深厚的孺慕之情。

关于戈鲲化来到宁波之前的情况，现有记载也不够详细。从《波士顿每日广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 1882年2

月22日的报道中,我们得知戈鯤化曾获得“硕士”(Master of Arts)。这可能是美国人对曾经参加过的考试的一种比附性的描述。按照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硕士”似乎应该相当于举人。但是遍检《安徽通志》(光绪四年修),并无他中举的记录,因此他究竟取得了何种功名,还要再作考察。也许,他只不过中了秀才而已。即使按照他曾经考中过举人来对待,他也并未能授实缺,只是一个候补的知府(很可能是捐来的),这在他到哈佛前所签的合同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于是他也就和许多读书人一样,为了糊口,去做幕僚。戈鯤化开始游幕的时间大概是二十一二岁。其《人寿集自序》:“余弱冠,读书不成,从军幕府。”有资料表明,至少他在22岁时,到黄开榜军中做幕僚,干了五六年。^[5]黄开榜,湖北施南人,加入湘军,以剿灭捻军起家,官至总兵。同治年间,太平军渡江北征,围天长,黄开榜水陆夹攻,解天长围。其后,又参加了九洑洲、七里河之战,为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同治十年(1871)卒。事见《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八本传。但戈鯤化在黄开榜幕中的情形,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只字不提。另外,据前引黄钰的序中,我们知道他“逮庚申毗陵烽燧之变,篋中藏稿尽遭劫烬”。庚申是清咸丰十年(1860),这一年闰三月,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等会援天京,大破清江南大营,四月,攻占常州、苏州、嘉兴等地。毗陵即常州。由此可知,在太平军攻陷常州时,他可能正随黄开榜驻扎在那里,颇经历了兵燹流离之苦,逃亡时甚至连诗稿都来不及带。此后,他又在黄幕中干了几年,大约在清同治二年(1863)前后,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直到二年期满。移居宁波后,他一直在英国领事馆任职,但我们只知道他颇受中外双方的称赏,其

具体情形,也还不甚了了。

戈鲲化虽然胸有大志,自负才高,但却始终没有机会走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理想的进身之路。尽管他在美、英领事馆工作了十几年,但从作品中所反映的情绪看,他也似乎并未对这种工作怀有多少成就感和自豪感。惟有创作的诗,可能被他认为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称道的东西之一。

戈鲲化的诗当时很受推重。章鋈序云:“新安戈君砚昀,天才踔厉,尤好吟咏。兴之所至,辄濡墨伸纸,顷刻数千百言,空所依傍。是其专主微眇,有真性情以贯之,复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抒其所见,岂规唐摹宋,务求形似,而神不相属者所能及乎?”黄钰序云:“太守之诗,不拘一格,要其历览山川,胸次高旷,情兴所寄,搦管成章,不屑屑以描摹见长,而渊懿醇茂,风华绮丽,靡不毕集,殆震川所云‘得西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颦’者乎!”这虽然多为师友之言,但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其创作特色。

从本质上看,戈鲲化是一个非常边缘性的文人,但他却一刻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服膺儒学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即使身在领事馆,他更关注的仍然是中国人民的疾苦。宁波有一座浮桥,为西方人所造,当地凡需过桥者,每人须交税四钱,西人一年即可收入万余贯。戈鲲化在领事馆工作,深知其内情,于是建议知府陈政钥募集资金,从西人手中买了下来,从而造福当地百姓。但是,他的深刻观察力又使得他能够把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对民众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也有所揭露,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民有三疾,诗以悯之》之《狎妓》写道:“迷津孽浪惨滔天,错认风流夙世缘。梦醒阳台金易尽,空嗟失足误青年。”《纵博》写道:“快意豪情莫与京,逢

场兴剧藐输赢。牧猪奴戏原轻贱，况破家资业未精。”《嗜赌》写道：“短榻横眠趣味多，一灯遑问夜如何。膏肓深入医无术，谁信烟魔胜病魔。”这些，确实都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戈鲲化将其写在诗歌中，说明他和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经常考虑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戈鲲化近 30 岁来到宁波，此前所作的诗已经全部毁于兵火，现有作品基本上是记载在宁波一地的所见、所闻、所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宁波地方文献来读，也说明他具有一定的“诗史”意识。他的《久寓甬上，见闻所及，有足喜者，各纪以诗，得绝句八首》、《客问甬上风俗之异，因赋四诗答之》、《甬上竹枝词》、《续甬上竹枝词》、《再续甬上竹枝词》、《三续甬上竹枝词》等篇，都具有史料价值。如《久寓》诸诗之三云：“粤寇猖狂踞郡城，祖鞭先著仗书生。贼闻胆破仓皇走，落地开花炮一声。”记载了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占领宁波后，清军组织反攻，宁波知府陈政钥募集民团协同，又得到英国军舰的帮助，终于收复宁波。之四云：“藏书阁比鲁灵光，劫后牙签半散亡。检点残编珍世守，故家乔木尚苍苍。”则是说经过太平天国之事后，宁波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散失过半，表达了对由于战乱造成祖国文化遭受严重损失的痛惜和思考。再如《客问》之一云：“垂鬟女子态娉婷，弱质娇姿正妙龄。都说无才便是德，不教幼读《女儿经》。”写宁波虽然是通商口岸，思想活跃；清代的妇女读书写作也早已不是什么奇事，但宁波一地仍有严重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与这个地方的开放性恰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三续》之八云：“灾生顷刻燎方扬，乡井同心救不遑。龙德常占潜勿用，用之制火效彰彰。”写城市发达之后，人烟稠密，房屋鳞次栉比，防火救火十分重要。于是人们

组织起来,以建会的方式,准备好水龙,以备不时之需。凡此,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戈鲲化的诗中也表现出面对西方文明传入的震撼,以及所进行的思考。如《三续》之一:“琛赆招来海国商,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画,楼阁参差映夕阳。”之二:“千里邮程达上洋,轮船一夜快非常。不须艳说滕王阁,风送才人过马当。”之三:“印板分明尺素裁,新闻市价一齐开。沿门遍递争先睹,《申报》今朝又早来。”之六:“又新街接日升街,纸醉金迷色色佳。要使游人心目炫,东西洋货巧安排。”或言城市建设,或言邮递速度,或言报纸之重要,或言街市之繁荣,都是西方文明传入后带来的新气象。他的《偶乘火轮车放歌》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篇佳作。作品先指出,先进的运输工具的创意原是出自中国,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轩辕皇帝善物物,偶见飞蓬制为车。后来周公众巧聚,指南远服僭任侏。木牛流马犂犂饷,葛相意造此权舆。”但是,这种创意在中国没能得到发展,却被西方后来者居上:“中国失传泰西出,曰英圭黎尤杰殊。采煤铸炭实车腹,气之所鼓雷霆驱。”火车构思精巧,坐在车上,真有风驰电掣之感:“我今坐向吴淞口,旋转卅幅同一枢。暗设机关夺造化,繁车之人真仙乎。在地疾走铁奔马,在天健行迈跂乌。”但戈鲲化最后的结论却是:“然而百利一大害,覆辙每遭肝脑涂。所以圣人揜不用,宇内坦荡有康衢。”这似乎仍然有些保守,但是考虑到他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而言的,而且揭示的是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事实,所以体现出的仍然是一种开放的气度,和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骂倒之士终是不同。

戈鯤化的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感情真挚，以情取胜。无论是登山临水，描摹风物，还是亲友应接，倾吐心志，都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饰，语言本色，自然清新。正如陈劭为其作序时所评：“辞句清新，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也。”如写节物风光，《窗外棠梨小桃》：“棠梨郁郁隔窗栽，掩映夭桃满树开。为惜春光慵扫地，落英留与点苍苔。”《中秋》：“水晶宫阙玉为堂，对酒吟诗兴欲狂。直到五更虫语静，起看凉影白于霜。”再如写个人情志，《夏至日写怀》：“夏至一阴生，消长悟天意。株守非良谋，萍飘岂吾志。黄金得不难，清名污最易。沧海变桑田，笑人枉趋避。”《自嘲》：“才庸志大俗情牵，斗酒何妨醉十千。帐下争名空斫地，马前陈策枉谈天。封侯有愿慵投笔，求富无能愧执鞭。莫怪年来通道广，媿隅听罢总茫然。”又如写友朋相接，《招陈纫斋李子仙二君春饮五飞白轩》：“天地吾大庐，中有一轩窄。欲问轩何名？名曰五飞白。置酒作主人，开轩招嘉客。嘉客爱飞觞，狂吟不拘格。希夷真酒仙（自注：纫斋善饮），青莲老诗伯（自注：子仙耽吟）。浮蚁须及时，征鸿且留迹。君不见春鸟劝提壶，劳人嗟行役。千金抵得此身闲，九十韶光莫虚掷。”都是如此。晚清诗坛，流派众多，百花齐放。戈鯤化与黄遵宪、梁启超等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却没有追随这些人参加以新名词、新事物入诗的“诗界革命”；宋诗派风靡同光朝，陈衍、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等名重一时，提倡古雅之风，追随者众多，戈鯤化也没有加入这一潮流。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独任性灵的诗人，所以并不去着意追求什么。但也许正因为他和当时诗坛的主流相距太远，再加上受到生活阅历的限制，诗歌的气局不够开阔，也是事实。